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OPENING DOORS Dr. Schumpeter

开门(上) ——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

[美]洛林·艾伦◆著
马春文等◆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OPENING DOORS Dr. Schumpeter

开 门(上)

——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

[美] 洛林·艾伦 ◆ 著
马春文 等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 / (美)艾伦著;马春文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68-3

I. ①开…

II. ①艾… ②马…

III. ①熊彼特, J.A.(1883~1950)—传记

IV. ①K837.1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265 号

开 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上、下)

著 者:(美)洛林·艾伦

译 者:马春文等

责任编辑:王平 门雄甲

封面设计:张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37.75 字数:52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68-3

版 次:2011年1月第2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实录》（10卷）、《北大哲学门》（10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卷）、《楚辞源流选集》（5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本）、《绿色经典文库》（16本）、《大美译丛》（8本）、《支点丛书》（10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前 言

沃尔特·罗斯托

《开门》是一部研究熊彼特生平和思想的传记精品。大经济学家的传记不多，这并不奇怪。很少有人能集传记艺术和某一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于一身。甚至还有很多人反对做这种努力。彼得·梅德华（Peter Medawar）爵士曾写道：“科学家的生平，作为生平几乎都不值得一读……他们的私生活可能痛苦不堪、杂乱无章、滑稽可笑，但这与他们工作的性质或方向无关，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事情。”

当然，我们有大卫·休谟的简洁生动的自传和几部关于其生平的著作。休谟是他所处时代公认的才华横溢之人，有多方面的建树，而不仅仅是一个地位被低估了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传记也有几部，但都没有突破梅德华爵士勾画的样式，也没有把亚当·斯密的生活与他的经济学联系起来，但关于他对牛津的厌恶也许是个例外。同样，我们也对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有所了解，知道他们的真挚友情，但没有人去深入探讨他们的个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卡尔·马克思的情况有所不同。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他们两人引起了传记作家的极大兴趣，有很多关于他们的传记。我在此不想评说这些文献。人们对穆勒的《自传》和他所受的反常的教育、心理的和思想的危机以及与哈丽特·泰勒的微妙关系作了很多探讨，就连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也写了一部关于穆勒和泰勒夫人的小册子。马克思致力于用他的经济社会动力学改变历史，他的这种努力与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窘迫的私生活一起，令许多分析家流连忘返。

凯恩斯为马歇尔写了一篇出色的回忆录，这是一部知人论事，并以此解释经济思想的最成功的著作之一。像穆勒和马克思一样，凯恩斯本人也是一个小型传记产业的创造者，其中，哈罗德（R.F.Harrod）和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的作品颇令人注目。我当然还能列举出许多传记文章，例如熊彼特的《十大经济学家》，但大致说来，这些就是全部了。

我相信洛林·艾伦的熊彼特研究是这组文献中的精品。在分析熊彼特的生平时，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罕见的意识：人类个性的极度复杂性和有限的可透视性。熊彼特生活的各个阶段都令人想起大卫·休谟年轻时的格言：“人是什么？一堆矛盾而已！”

洛林·艾伦没有提供一种堂皇的、明确的弗洛伊德理论（或其他理论）来“解释”熊彼特。但随着熊彼特紧密交织的个人生活和事业生涯的展开，艾伦对两者之间的联系方式提出了一种发人深省的看法，并且在最后精彩段落中，他做了使人难以忘怀的总结，“一个多方面的矛盾重重的人”，事业生涯使他“挫折和绝望”。

尽管熊彼特作为个人是复杂的，但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工作却是非常清晰并前后一致的。他始终是一个博学的经济思想史家，是一个将他本人在这一领域所感受的诱惑和激动传递给他人的教师。他相信一个学者的“观点”（vision）是在其人生的第三个十年确定的，后来的职业生涯主要是阐释这一“观点”。他不仅自己按这种想法生活，而且还将这种理念植入了一群有天分的学生的心灵，改变了这些学生的生活和事业。至于说矛盾，有谁因为一个大学图书馆员没有慷慨地借书给自己的学生而对之兴师问罪，弄得人家与自己决斗呢？

在他对过去和同时代的同行经济学家的评论中，他表现出了非凡的宽容大度，即使他们的观点与自己不同，他充分压抑了自己经常持有的强烈偏见。在与学生的关系上，他一直避免培养信徒。他鼓励自己周围那些有天分的年轻经济学家追寻各自的“观点”。

另一方面，熊彼特的“观点”早早地就确立了。他执着于这一“观

点”，至死方休。在 25 岁时，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经济理论的性质和主要内容》（1908 年）。这是一部静态经济理论研究，里昂·瓦尔拉斯是这一理论的中心人物。但它仍然预示了熊彼特事业生涯的主题——创建合乎逻辑的形式化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动态。在《经济理论的性质和主要内容》一书中，他指出静态学和动态学是截然不同的领域，他的结论是：“仍然处于襁褓之中的动态学，是未来的田地。”

到 1919 年，他已经在这块田地上辛勤耕耘了。他写出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大部分内容，该书在两年后出版，当时他还处于其“神圣的十年”。在他事业的最后阶段，他仍然奋力拼搏，为他在《经济周期》（1939 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 年）和《经济分析史》（1953 年）等著作中表述的资本主义动态观寻找确定的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是熊彼特最通俗易懂的著作，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所带来的社会政治条件将不可避免地压抑创新，导致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熊彼特会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的名声感到惊讶）。

《经济周期》试图将他的创新理论与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结合起来，把握资本主义及其 18 世纪末以来进化过程的动态。这部著作仍然是熊彼特探索道路上的一座令人肃然起敬的纪念碑，但它并不令人信服（也很少有人拜读）。

他的《经济分析史》本是对动态分析进行特定综合的序曲。他为这部著作投入了 9 年的辛劳，但直到他去世时，该书仍未完成。他终究未能找到一种把他的观点——可以定义为通过内生地包括重大结构创新而使瓦尔拉斯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动态化——变成现实的方式。随着年龄的增长，熊彼特有时懊恼他未能成为经济史学家。在另一些场合，他懊恼自己没有多学一些数学。他试图通过这两种途径，以一种勤奋但基本上是外行的方式达到他的目标，但两条路都失败了。

熊彼特的目标是用形式化理论解释和表述现代社会动力学的核心过程。使 18 世纪末以来的世界经济与其他时代相区别的是，有史以来，发

明和创新第一次成了一种潮流，而不是星星点点、稀疏离散的事件序列。这种潮流是连续的，在某些部门相当稳定，像亚当·斯密想象的那样与市场的扩大联系在一起，但发明和创新也采取具有巨大创造力和破坏力的重大革命事件的形式，不可逆转地改变经济的结构和社会政治生活格局。当这些重大创新被引入世界经济时，它们也会在许多方向上启动收益递增阶段。

亚当·斯密——几乎独一无二地——区分了两种发明，这种区分处于熊彼特见解的中心。在他的《讲稿》和《国富论》中，斯密都提醒人们不仅要注意那些实际操作机器的人设计的发明——一种连续的边干边学——而且还要注意“哲学家”（科学家）创造的与“以前未应用的新动力”有关的发明。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回顾，斯密注意到这种重大创新是偶然事件。但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18世纪80年代）中，在历史的一个巨大的分水岭上，包含“新动力”的创新节奏大大加快了，瓦特的蒸汽机、工厂制造的棉纺织品、焦炭炼铁，在这十年中都作为操作性创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铁路、廉价钢、电、内燃机、新化工品、微电子、基因工程、激光和大致分四批出现的新工业原料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接踵而至。

到1870年左右，亚当·斯密的继承者讨论了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与全部经济过程内生地联系着的革命性技术变化。18世纪时，大卫·休谟已指出了最基本的联系原理：“需要……是工业和发明的巨大动力。”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动荡岁月中，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争论了新机器对就业、出口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受约翰·雷和查尔斯·巴贝奇影响，J·S·穆勒不仅讨论了他所处时代的技术革命，还讨论了技术革命的科学根源，讨论了如何巩固在技术上生机勃勃的经济的科学基础这一问题。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巴贝奇的影响，马克思从李嘉图的判断——机器的使用有时会降低就业水平——引申出了他自己的中心命题之一：为阻止货币工资率上涨，企业家使用机器保持大量的“失业后备军”。

边际革命以及用微积分形式化地定义微观均衡和一般均衡的可能性

对主流经济学的诱惑改变了人们将不断扩张的技术（不论是创造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作为经济生活和理论分析不可逃避的现实而接受的自然而然的做法。创新被推到了一边或丢给了经济系的某个偏执、不合时宜的学者。原因很简单，递增收益及其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使经济学家无法形式化地定义均衡位置。瓦尔拉斯优雅的一般均衡只有在既定的、不变的经济结构中才能界定。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中对数学有最好的把握，他特别清楚这一困难。他明确区分了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在两个附录中戏剧性地表述了广泛存在的递增收益对形式化理论提出的问题，在短期假定下改善了均衡微观分析的技术，在使长期微观分析形式化方面进行了勇敢但未能成功的尝试，在讨论长期变化时回归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从这一经历中，他得出结论：

正常需求和供给的稳定均衡理论的确有助于使我们的思想具有确定性，在其初级阶段它不会使我们远离生活，只要它不阻止我们给出最强有力、最长期持久的经济力量团体行动主要方法的相当可信的图像。但当推到它的更遥远、更微妙的逻辑结果时，它便离开了实际生活状态。实际上，我们在此位于经济进步这一重要主题的边缘上。因此在这里，特别有必要记住经济问题被作为静态均衡问题而不是有机增长问题处理时，对这些问题的表述是不完全的，虽然静态处理本身能给我们的思想以确定性和准确性。因此，是将社会作为一种有机体进行更适当分析的必要引论，但它只是一种引论。

它不过是研究表现有收益递增趋势的工业进步和发展的导论。它的局限性经常被人们忽视，特别是被那些从抽象角度考虑这一问题的人忽视，以至于有将它定型的危险。

马歇尔知道他不能以形式化的数学手段解决长期分析问题，但这并



不使他特别烦恼。他认为经济学在本质上只是一个生物学学科而不是新牛顿物理学的分支。并且，马歇尔和他的追随者最终也没有试图提出一种纯粹的经济科学，而是试图改善穷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熊彼特对此十分不满。的确，几乎所有遵循休谟和斯密传统的英国经济学家一开始就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为服务于政策，经济分析必须与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相结合，与历史和社会科学提供的其他见解相结合。因此，他们不像熊彼特那样关心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水平，使之与新牛顿物理学相当的这一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熊彼特创造一种优雅的、动态版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的浪漫主义努力是不可能的，也许甚至是方向错误的梦想。在他的《经济周期》一书中，他最后说：

我花费了比我想象得更长的时间把那一脚手架《经济发展理论》变成了一个建筑，将我后来工作的结果包括进来，补充历史的和统计的资料，扩展原有的边界。然而，我怀疑这一结果是否担当得起这个比喻。这栋建筑显然没有完成，未及装备——有太多明显的缺憾，太多未完成的任务。仅限于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统计资料，虽然是严重的缺憾，却不是所有缺憾中最严重的。青年一代经济学家应当把本书看成只是一个开始——对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启动项目。没有什么能比这一点更令我感到快乐。

他的《经济分析史》花费了9年的劳动，却一直未能完成，这也许是一——至少部分是——他的挫折和失败感的结果。

洛林·艾伦对我指出，如果当时有非线性动力学和混沌理论，熊彼特内心的郁闷也许能有所缓解。的确，一系列重大创新的引入使经济增长变成了深奥复杂的非线性过程，也许会产生混沌结果的（有界的）创造—毁灭湍流在其中汹涌澎湃。如果我们有必需的数据，即使没有经济计量学对空白表格的填充，非线性动力学的出现也许仍会解决熊彼特在

瓦尔拉斯均衡的优雅和经济生活内在地处于永久性非均衡的认识这两者之间的精神冲突，使他相信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因为他确实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从瓦尔拉斯的供给既定条件下的一般均衡概念出发，熊彼特从广义上定义了作为“基本经济发展现象”的重大创新，而且他使用了明显与非线性动力学精神相通的语言：

在我们的用法上，发展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完全不同于在循环流转或达到均衡的趋势中所看到的一切。它是在流动的渠道中自发的、非连续的变化，是均衡的扰动，它永远地改变和取代着先前存在的均衡状态。

这里，我们有了一个内在于体系的过程——内生的，非外生的。它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结果，而且只要这个过程持续，它便内在地处于不均衡之中。熊彼特很清楚他的假定——资本主义时代的重大经济变化以一种不可逆转的、革命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连续、渐进的适应出现——在理论上是爆炸性的。例如，他提到，马歇尔未能克服“围绕收益递增问题的困难”。但直到最后，他一直勇气十足地探讨他的命题的含义，努力用一种系统的理论表述他的发现。

熊彼特的命题当然不是一种完全的增长理论。它只讨论了生产函数的一个方面，即重大技术变化在维持产量增长和诱发周期性波动方面的作用。例如，他的结构缺乏一种将出生率和死亡率与发展联系起来，把与人口有关的住房、基础设施和农业投资考虑在内的理论。它把开辟一种新的食物或原材料供给来源与技术 and 制度变化归为一类而没有考察它的特点，例如相对价格事先的变动和通常比工业投资更长的孕育期。它也没有讨论增长的阶段和极限。但就其本身而言，考虑其所处的时代，《经济发展理论》是经济思想史上一部影响巨大的、创造性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据说，温斯顿·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人们经常绊倒在真理



上，但大多数都爬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赶路了”如果主流经济学的实践者没有像这句名言所说的那样行动，后来的主流经济学不会缺少它本来应该包括的很多内容。

当然，经济学家按照熊彼特开创的传统对创新做了很多进一步的工作。但直到今日，主流经济学一直努力回避似乎可以称之为“熊彼特问题”的问题。他们把结构性创新作为外生性变量，或将它们埋藏在诸如资本深化、中间性生产、资本—产量比率或剩余等高度加总的黑箱之中。它的实践者继续用微积分玩均衡游戏，无视他们假装提供分析和处方的动态经济的中心特征，经济总是处于不可逆转的变化过程之中，而不是处于均衡之中。当然，像马歇尔所理解的那样，均衡分析有其教学作用，在考察严肃的经济问题的初始阶段是有帮助的，但它不能处理“有机增长”的复杂性。

我相信，熊彼特的挫折感一部分来自这一困境，他没有能力将他的有力的、对创新重要性的正确理解翻译成一种优雅的瓦尔拉斯式的数学表述或有规律的历史叙述。而均衡分析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内在的杂乱，注定要否定他用浪漫的术语为自己建立的成功。本书的读者会发现造成他表面上轻松愉快生活的阴郁底色的其他——个人方面的和专业方面——来源，包括成为他所处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强迫感，这也许是他守寡的母亲通过她的 wunderkind（神童）身上寻求成功而加之于他的形象，在政界和商界的相继失败。1926年具有震荡性的三重悲剧，用洛林·艾伦的话来说，“禁锢了他的余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作的出版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对他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的忽视（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最后，他莫名其妙地同情的国家——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

就其熊彼特对他所从事的行业历史的知识是无与伦比的，在激励有才能的年轻人方面，他具有出乎寻常的能力，并得到了他们长期持续的感激。如果说他未能完成他年轻时的梦想，大卫·休谟或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或阿尔弗莱德·马歇尔也都是如此。用 F·H·哈恩和 R·C·O·马



修的生动描述来说，熊彼特没有用他的才华去加固相对说来已经很结实的链环。他大胆形象地说明 1870 年后主流经济学系统地忽略和回避了创新过程，是没有王子的《王子复仇记》。他不仅在更大的范围上探索了创新过程，而且也开始长期的、艰难的、未能完成的工作，试图使创新过程成为动力经济学的内生部分，并因此将它连接到理论主体之上。

没有哪一位先驱、同代人或后来者能声称比他做得更多。他当然配得上这样一部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的、充满敬意、坦率和感性的传记。



序

洛林·艾伦

对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的这一研究源于这样一种信念：这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说明了人类头脑和人类灵魂的运行方式。它也告知我们社会和经济分析的进步是如何出现的，并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多侧面的人的故事。

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直利用、忽视了他们的伟大人物的工作。他们常常再发现某位被忽视的贡献者。但除去轶闻式的知识外，他们忽视了完整的人。几乎可以说，近期内这现象的唯一的例外是 20 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47 年，我成为哈佛的一位研究生，我是熊彼特的许多学生之一。尽管我选修了他的高级经济理论和经济文献史，我却从来不是他的亲密之人，也不是他内圈的学生之一。在年复一年的经济发展和历史研究中，我对熊彼特的敬仰增加了。1980 年，在和我的同事约瑟夫·麦金纳——他也是熊彼特的学生——的谈话中，我们慨叹大经济学家的传记不多。这部书就是由这次谈话引发出来的。那年夏天和接下来的 6 个夏天，我一直在哈佛档案馆研究熊彼特的文稿。

熊彼特的许多学生和同事以及那些在美洲、德国和奥地利对熊彼特的生活和工作感兴趣的人对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前一类人中包括戈特弗莱德·哈伯勒、瓦西里·里昂惕夫、阿瑟·斯密西斯（已故）、爱德华·梅森、保罗·斯威奇、保罗·萨缪尔森、尼克拉斯·乔治斯库-罗京、托尼·斯多尔普（已故）、赫伯特·弗尔斯、雷德沃斯·奥佩（已故）、弗利茨·马克

